

你想如何被铭记？

陈纳德深知并接受这个现实——应当对得起中国对他的期待，他知道，除严格遵守之外没有其它选择。同样，企业必须完全遵守税法，没有其他选择。任何偷税的行为都有风险，风险意味着麻烦甚至处罚

文/艾德(Michael Aldrich)

艾德(Michael Aldrich)，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在公司法和商业法领域经验丰富，同时是电信领域的专家。大学学习历史，后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消逝的北京》一书

一个中国朋友前些日子向我抱怨，他的公司在美国的税收筹划实在是太复杂了。似乎过于沉浸于自己的聪明智慧，想让我认可他规避美国税收的想法。但我并没有直接告诉他在瑞典等国家有比美国更苛刻的公司税收的法律规定。我只是向他解释，他的公司要如何承担公司责任，并且依照税务顾问的意见纳税。

这类回答会让一些企业家们感到失望。他点燃一支香烟，用五指梳理了一下头发：“告诉我，你是如何看待这种避税方法的？”他似乎又在酝酿另一个复杂的计划。

我将身子略微前倾，从眼镜上方仔细端详他，“把我想成一个医生。医生的工作就是让你健康，同样，我的工作就是将你的公司保持在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中有一些基本规则。如果你向医生咨询抽烟是否有害健康，他一定会马上回答‘是’。如果你问‘那么如果我隔一天抽一次烟呢？’答案也是同样的。‘那么如果我上午抽烟，下午去锻炼身体呢？’答案还是不会变。同样地，完全遵守税收规定，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任何偷逃税收的行为都有风险，风险就意味着麻烦甚或处罚。”

为了不让他觉得我是个过于古板的人，我抽出了烟斗，并往里塞了些樱桃口味的弗基尼亚烟草。（我经常抽烟斗，因为那让我想起我们的父辈，那时的美国老百姓有一种在 21 世纪很难找到的礼貌和直率）。我吐了一口烟，漫不经心地凝视着从烟斗中缓缓升起的烟雾，并和他的香烟烟雾在我们头上方混合在一起。这样的烟雾让我想到了云南。

我问我的朋友，是否听说过一个叫陈纳德的美国人，他说没有。

回到 1937 年，一个美国军官从部队退役。退役的第二天他便开始了在中国担任空战顾问的生涯。日本在那年夏天刚刚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当时，中国空军人才缺乏。彼时的空军顾问来自意大利，但意大利顾问当时正承受来自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强大压力，只能给予中国最低限度的帮助。这位美国新顾问名叫克莱尔·陈纳德，他的工作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纳德取代了意大利人，并且引入了一整套全新的训练技术，为中国飞行员设计出可以对日本零式战机的结构性弱点进行打击的办法。此外，他还为中国政府穿针引线，帮助其获得美国贷款，用以购买更新更强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战斗机。陈纳德还发明了一套被称为“无线竹”的系统，让在日统区的中国侦察员可以通过无线电波报告日本轰炸机的动向，使得被轰炸城市的居民能够及时撤离。这个系统挽救了数十万中国百姓的性命。

到了 1940 年，陈纳德得出结论：富有经验的飞行员可以极大地推进中国空军力量的发展。他雇佣了 500 名美国军人加入“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抵抗日本法西斯。

空军志愿队以昆明为基地，于1941年雨季过后，在重庆首次亮相。自从1937年，重庆对于日本的空中轰炸就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当第一架空军志愿队的战斗机载着老虎标志与中国的标志从重庆上空缓缓而有秩序地飞过，保证这个城市能够抵御空中入侵时，重庆市民的欢呼声在长江上呼啸而过。当天晚些时候，当一架空军志愿队的飞机在众人面前击落数架日本轰炸机时，整个重庆市爆发出了彻底的欢呼，一串串的烟花放遍大街小巷，市民情绪激昂地敲锣打鼓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这是一种从四年来承受残酷轰炸的绝望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欣喜。日本再也不能肆意欺凌中国。这些“飞虎”们保证了战局的天平向我们这边倾斜。

就像现在我们这个漂浮不定的世界一样，空军志愿队的许多热切盼望并没有实现。在美国参战后，空军志愿队就被编入了美国空军，在官僚气氛中变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罗斯福总统指派“酷乔”史迪威作为美军在中国的总指挥。史迪威将军从一开始就和蒋介石保持了一种虽然谈不上敌意，但却是焦躁的关系。当史迪威正确地意识到蒋介石军队计划的严重不足时，他却不懂得如何与蒋介石交流。他不和蒋介石说话，从不视蒋介石为他的司令员，并总是摆出一种“百事通”式美国人的高傲自大腔调。

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国民党重庆政府不可救药的腐败恶化，史迪威的敌意也进一步强化。尽管美国是中国的同盟，但丘吉尔政府继续对中国实施“稍加掩饰”的鄙视，这是一种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常见的藐视态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同样另人费解的是为何直到1943年美国 and 英国才废除在19世纪末与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下的各种特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陈纳德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他对于欧美当时的高傲态度不屑一顾。在他与蒋介石的接触中，他总是彬彬有礼并最大程度地遵照蒋介石的政策。他总是坦白地表明自己与蒋介石的不同观点，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也从不用中国盛行的那些客套话掩盖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总是很坦白。

陈纳德一直与史迪威处于持续激烈地摩擦中，在陈看来，史迪威表现地像一只趾高气昂的孔雀，侮辱他的中国主人，且从来不去学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这可能是由他们不同的出身造成的。史迪威毕业于极富盛名的西点军校，而陈纳德则从路易斯安那贫民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路奋斗到当时在军队中的显赫地位。

陈纳德被很多美国历史学家批评为考虑问题过于僵硬死板，某种意义上不无道理。因为他一向致力于中国对日本的完全抵抗，所以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那时达到了愚忠的程度。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视而不见，并向美国记者解释说作为一个军官，他没有责任和义务纠正中国政府的失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航空技术的发展，他的战争策略被证明正确而有效。然而他的部分计划却没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使得日本军队如潮水般地侵入未沦陷区，比如桂林。当冷战降临时，陈纳德则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他把世界看成由朋友和敌人组成的。从他的逻辑看来，朋友应该互相照应，因此，他从不怀疑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政策，甚至在他们失败并撤离到台湾之后。

或许一两个逸闻趣事能更好地概括这个人。陈纳德钟情于四川的红辣椒。他的桌子上有一个五升左右的瓶子用来装辣椒泡菜，在雪茄盒中也有一大包生的红辣椒。他有时会悠闲地拿起一个放到嘴里慢慢品味咀嚼。一个接一个，直到天黑，就像嚼口香糖一样。“这比咖啡更能提神。”他大声地向疑惑的秘书说。

当被问及美国的国外支援时，他在美国国会的听证说，“我们派遣人员支援，有些可能是很笨的人，大概是我从来没遇到过的最愚昧无知的人。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救援政策，我们已经深入接触那里的人民，而且和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成为朋友。”正如在一阵为利益而争，不可理喻的冲突之后，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¹激进地捍卫自己世界银行的工作一样，陈纳德的话至今仍然句句铿锵。

尽管有些批评不失公允，我还是认为陈纳德是一个伟人。当然我可能不赞同他世界地理政治的观念，无可否认的是，在当时，欧美世界弥漫着白人优胜论和殖民高傲的氛围中，陈纳德忠实坚定地服务于国民党政府和中国人民。他自己献身于中国对外来侵略的抵抗。在这方面，他是中国在军事上的“白求恩”。他从不小觑蒋介石总统，并在中国法制体系下按照二战中中美之间的承诺全力支持蒋介石。陈纳德深知并接受这样的现实，就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期间他应当对得起中国对他的期待。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知道除严格遵从之外没有其它选择。

他于 1957 年去世。关于这位出身劳工阶层、性格坚毅、对中国满是赤诚之情的美国将军，目前已有两本回忆录。在自傲而孤立的台湾，有且仅有一尊雕像来纪念这位外国人，那就是陈纳德。在世界的另一边，美国弗吉尼亚阿灵顿的最负盛名的军人纪念碑中，陈纳德的名字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刻在墓碑上。这是他希望被人永远铭记的方式。

我停下，重新点燃我已经熄灭了的烟斗，又吐出一阵烟雾弥漫在空中，望着我的朋友：

“那么，你希望如何被铭记？”

版权所有 © SGLA 2008。

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